

20世纪以来吐蕃金银器的发现与研究

霍巍 祝铭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5)

摘要 吐蕃金银器是吐蕃时期考古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在青藏高原考古工作中发现了一批重要的吐蕃金银器,成为我们重新认识传世吐蕃金银器的一个重要标尺,从而可以将过去流传于世的一批金银器的来源、真伪、研究价值等方面的情况进一步廓清,对于其种类与功能、制作工艺、社会历史背景、从中所反映出的吐蕃与中原及其周边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等问题产生出新的认识,并且展示出这一研究领域宏大的学术空间。

关键词 吐蕃金银器;吐蕃考古;高原丝绸之路;西藏考古

DOI:10.16249/j.cnki.1005-5738.2020.02.002

中图分类号 K876.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5738(2020)02-008-009

本文所论的“吐蕃金银器”,是一个相对较为宽泛的概念,从地域上看,主要是指以青藏高原为主体发现的金银器;从时代上看,是以吐蕃时期的金银器为主,上限可前溯到吐蕃“早期金属器时代”(距今约1000年至公元7世纪);从制作和生产这类器物的地域上看,则可能涉及到吐蕃以及吐蕃本土之外的中原汉地、中亚、南亚地区,所以或许称其为“吐蕃系统金银器”更为恰当^①。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由于考古出土材料的罕见,对于吐蕃金银器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一些私人收藏家的藏品,以及流传于各博物馆的部分传世金银器。半个多世纪以来,海内外各大博物馆藏和私人收藏的吐蕃金银器材料不断涌现,关于吐蕃金银器的研究也一直在持续升温。但是,一个很大的问

题在于,这些研究对象一般都没有考古学的出土背景,对于其年代、真伪、性质以及其他相关信息几乎一无所知,成为科学研究这些文物最大的“瓶颈”。

近年来,随着青藏高原不断出土具有考古背景的新材料,青海等地的田野考古成果尤其引人注目,使得这一领域的研究状况也随之发生了重大的改观。及时地对这些研究情况加以总结和展望,将有助于我们掌握相关信息,调整研究思路,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找准主攻方向,不断深化认识,取得新的成果。基于这个出发点,本文拟讨论20世纪以来一些最为重要的有关吐蕃金银器发现与研究的状况,以期得到学术界更多的关注,共同推进这一研究向前发展。

收稿日期:2020-04-25

基金项目: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高原丝绸之路”阶段性成果,项目号:16JJD780011

第一作者简介:霍巍,男,汉族,河北邢台人,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西藏考古、汉唐考古。

一、20世纪以来国内外吐蕃金银器的主要发现

公元7世纪初,松赞干布继赞普位,将政治中心迁至逻些(今拉萨)^[2]。逻些位于拉萨河下游谷地,自然地理条件优越,松赞干布在这里开拓荒地,划分良田牧场,发展手工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军事实力的增长,松赞干布逐步兼并了苏毗、羊同等部族,建立起奴隶制的吐蕃政权。吐蕃的建立,结束了西藏高原分散落后的局面,为青藏高原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此后,吐蕃对外交流的程度不断提高,除了原有的部落时期文化之外,大量新的文化因素开始源源不断地注入吐蕃文化之中。

吐蕃崛起后,实行开放的对外政策。一方面,与其东面的唐王朝发生了广泛而深远的联系。另一方面,吐蕃向西发展,不仅对西域实施了有效控制,还将其势力延伸到葱岭山区和恒河岸边^[3]。在吐蕃与周边各国文化往来的过程中,金银器充当了重要的物质载体。吐蕃制作生产的金银器经常作为向唐朝贡纳的礼品而频繁见诸史料记载。《旧唐书》《新唐书》和《册府元龟》等文献中,金银器经常出现在吐蕃与唐朝的往来活动中^[4]。这些文献材料表明吐蕃金银制造技术高超,金银器种类繁多,制作精美。金银器流行于吐蕃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经济、军事、政治和生活等。因此,金银器在吐蕃具有重要地位,吐蕃金银器的研究对于研究吐蕃的社会历史也具有重要意义。

金银器是吐蕃贵族墓葬中的重要随葬品,但目前发掘的吐蕃墓葬较少,且大多被盗,盗墓者所盗掠的对象主要就是金银器。这些盗掘出的金银器多流散至海内外各地,藏于各国博物馆内或一些私人藏家手中。吐蕃金银器发现与研究的历史与唐代金银器有些类似,都是先始于传世品的研究,而后由于考古学的发展,出土器物的不断增多,又反过来使传世品的研究趋于科学化、系统化。对于一些馆藏文物或私人藏品,研究和材料公布往往是相

伴而出的,所以我们将资料的披露和研究者的意见一并加以评述。整体而言,吐蕃金银器的相关发现及其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一)作为馆藏文物或私人藏品的金银器

吐蕃金银器中的重器,当属现藏于西藏拉萨大昭寺内的一件吐蕃鎏金银壶(也有学者称其为银瓶,以下两种称法均见)。1959年,文化部西藏文物调查工作组在拉萨大昭寺中心佛殿第二层西侧正中松赞干布殿内发现了这件银壶。20世纪90年代,宿白先生撰文介绍了这件银瓶,并对这件银瓶的风格、产地及流传路线做出推测。他从银瓶的形制和其上的纹饰出发,与境外相关遗存比对,认为这件器物可能是一件输入品,其产地可能在阿姆河流域南迄呼罗珊以西地区,年代约在七至九世纪^①。宿白先生敏锐地观察到此件器物的西方因素,先后三次撰文对其进行了介绍和研究,不断披露了这件鎏金银器的相关信息。

几乎在同一时期,国外学者也关注到了这件吐蕃银器。1996年,英国藏学家黎吉生(H. E. Richardson)也曾对大昭寺银壶进行研究,他认为制作这件银壶的年代约在公元7世纪,银壶上的饮酒人物图像体现了萨珊波斯艺术的影响^[5]。

其后,在2003年,瑞士藏学家阿米·海勒(Amy Heller)在一篇文章中对拉萨大昭寺银瓶上的人物服饰、纹样以及工艺进行了更为深入、系统的探讨,认为这件银瓶是松赞干布统治时期之后的吐蕃工匠融合西亚、中亚、中原地区的多种艺术风格而制作的艺术品,她广泛结合吐蕃历史、大昭寺史以及吐蕃神灵神话等资料,对银瓶上所拓打出的几组人物图像也进行了考订,拓展了研究视野。还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篇论文中,她还对都兰吐蕃墓群出土的以及国外藏品中的相关器物进行了考察,为建立吐蕃金银器器物群做出了可贵的尝试^[6]。2007年,中国学者杨清凡将这篇文章译成中文,全文刊登在由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主办的《藏学学刊》^[7],为学术界进行吐蕃金银器研究提供了重要的

① 宿白. 西藏发现的两件有关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物[J].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1994(6). 后来收录到了《魏晋南北朝唐宋遗稿辑丛》一书中,并新收入了《三记拉萨大昭寺鎏金银壶》一文,补充了一些新的考古测量数据和新的文物信息,参见该书第206-208页。

参考资料。

国外学者对于流传于海外的一些吐蕃金银器的研究从我们所掌握的有限的资料来看,在20世纪下半叶进入到一个新的高潮。1973年,菲利普·登伍德(Philip Denwood)介绍了一件藏于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的银碗,银碗上的纹饰描绘了《伊利亚特》中的故事,他认为这件银碗是在萨珊人被阿拉伯人打败后,由逃难的波斯王室带到西藏地区^[8]。很显然,作者已经意识到,吐蕃金银器和波斯萨珊王朝之间可能有着某些十分微妙的关联,从而将这件本不属于吐蕃系统金银器的银碗放置于吐蕃、阿拉伯大食帝国、波斯萨珊帝国这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下加以考察,这种眼界和视野极富前瞻性,对于后来的研究者无疑影响深远。

1998年,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的马撒·卡特(Martha L. Carter)博士对三件入藏该馆的所谓“西藏早期银器”进行了研究,这三件银器分别是一件银瓶、一件银带把杯和一件银角杯。卡特博士认为这三件器物应为一组,三件器物均包含粟特、波斯、中原地区等多种因素,他进一步推测制,作西藏早期金银器的工匠“应是一个多民族的混合体”,并且从制作工艺、金属学测试等不同角度进行了考察。^[9]

2006年,本文作者之一的霍巍获得美国亚洲文化协会(Asian Culture Council)项目资助,前往美国调查访问了十余座博物馆和若干私人藏家,了解到一批重要文物,并于2007年撰文介绍了这批文物,其中就包括了十余件属于本文所讨论范围的吐蕃金银器。文中认为这批器物既包含有唐、萨珊和粟特等地的文化因素在内,也很可能包含吐蕃自身独特的金银器制作技术与风格,这个观点后来在其所著的《吐蕃系统金银器研究》一文中进一步加以了阐述^[10]。同时,可以附带指出的是,霍巍在调查中还注意到,与上述收藏于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的三件吐蕃银器同进入藏的,还有一件完整的吐蕃儿童织物衣衫,这为后来国内关注吐蕃金银器与吐蕃丝绸流传海外的情况提供了新的信息。

2017年,葛乐耐教授(Frantz Grenet)撰文介绍了一件戴克成(Christian Deydier)收藏的鎏金银

壶。他认为这件银壶应属于一位吐蕃贵族,出自八世纪中期的一间皇家作坊。制作银瓶的工匠吸收了粟特的艺术传统,同时也从当时中原地区的唐朝艺术中汲取灵感,包括大乘佛教的某些表现形式也体现其中^[11]。

(二)若干有关吐蕃金银器的公开展览

近年来,海内外对于西藏高原考古、吐蕃考古和“一带一路”背景下青藏高原与“丝绸之路”的联系与交往等重大问题的关注度不断升温,也促进了海内外对于吐蕃金银器收藏和展示活动从以往学者的象牙塔公开走向社会。这个时期,一批数量较大、门类丰富、特点鲜明的金银器开始浮出水面,以公开展出的方式与观众见面。

2013年,香港梦蝶轩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作,举办了题为《金耀风华·梦蝶轩藏中国古代金饰》的公开展览,展出了近300件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1700年间欧亚及中国境内的金银器,其中也包括一批来源不明的“疑似吐蕃金银器”在内。香港中文大学艺术学讲座教授苏芳淑担任展览策划和图录主编,另邀请国内相关学者撰写了专题论文。该展览公开出版了图录,共一套三册,其中第二册《金耀风华·赤髯青骢》共收录105件(组)金银器,聘请霍巍为其撰写了相关条目说明和专题论文。^[12]霍巍在论文中认为,此次梦蝶轩展出的这批金银器门类涉及面广,纹饰题材丰富多彩,显示出很高的品级和独特的风韵,其中有相当部分器物可能是专为吐蕃较高级别的王室贵族、大臣或将领在丧葬仪式过程中所制作和使用的金银器,虽然没有正式的认定其出土地点,但基本倾向于认为这应当是一批出土于吐蕃墓葬中的金银器^[13]。随后,霍巍教授对此次展品中的两件宝马骑士形象金银饰片又作了专门研究,文中认为这两件金银饰片反映出吐蕃与欧亚草原文化之间密切的交流与联系。^[14]

2019年2月,由北京市人民政府、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办,北京市文物局、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青海省文物局协办,首都博物馆、青海省博物馆承办的“山宗·水源·路之冲——一带一路中的青海”展览在首都博物馆展出,展览展出了青海省442件(组)精品文物。在展览的第四部分“吐蕃东进”中,

集中展示了青海都兰吐蕃墓葬出土的一批金银器。这些展品中,许多金银器都是首次公开展出,极大地丰富了吐蕃金银器材料。值得注意的是,这批金银器无论是从种类、形制特点、制作工艺,还是从装饰风格、题材以及性质、功能等各个方面,都和上述香港梦蝶轩收藏的这批金银器极其相似,所以证实了霍巍的推测。香港梦蝶轩这批藏品绝大部分应为出土品,这两批材料很可能都同出于青海都兰热水境内的吐蕃墓地,可以归并在一起进行研究。

2019年7月,由敦煌研究院和美国普利兹克艺术合作基金会主办的“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艺术珍品展”在敦煌研究院举办,这也是国内第一次公开展出了来自国内外近30家文博机构、国外私人收藏的120余件套文物,其中也包括数十件吐蕃金银器。这批金银器中,有相当部分在霍巍在海外进行调查时已经加以著录^[15],但还有一些来自俄国、瑞士等国博物馆和公私收藏机构的藏品是第一次在国内公开展出,信息量很大。只是由于各种原因,此次展览没有公开出版展览图录的计划,信息未能公开,只能期待将来有可能公开披露。

上述这几次公开展出,给我们打开了吐蕃金银器前所未见的辉煌灿烂的画卷,其中集中了无数吐蕃金银器当中的精品,在制作工艺、装饰纹样、形制风格等诸多方面都体现出吐蕃系统金银器集大唐、吐蕃、波斯萨珊、粟特等金银器之大成的宏伟气派和精致特色,也为未来的吐蕃金银器研究预示了光明的前景。

(三)科学发掘与盗掘出土的吐蕃金银器

目前,由于各种原因,主动考古发掘所获的吐蕃金银器极为罕见,大多是被盗掘出土后追回,或者是在被盗掘后由考古工作者进行抢救性发掘时出土。

1982至1985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的热水乡、夏日哈乡等地发掘了一批吐蕃墓葬,其中出土了一批金银器。最早对都兰出土吐蕃金银器展开研究的是原青海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许新国,他在文章中公布了部分材料,他还将文中所列器物与粟特金属器物进行对比,认为二者纹样、风格十分相似,故将这

些器物归入粟特系统。^[16]

1999年,在美国企业家罗杰伟(Roger E. Covey)创办的唐研究基金会的资助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在都兰热水沟南岸发掘了四座大、中型墓葬,于2005年出版了考古发掘报告《都兰吐蕃墓》。报告中公布了10余件金银器,墓葬的年代大约为8世纪中期。^[17]

青海都兰吐蕃墓地的考古发现也引起了社会不法分子的注意,导致都兰吐蕃墓葬曾多次被盗。本世纪初,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西宁征集到一批都兰吐蕃墓葬的盗掘文物,其中包括20件动物造型的银器,许新国先生根据其制作工艺、纹样装饰等方面的比对研究,将都兰出土的这类动物形银器的族属确定为粟特。^[18]但学术界对于这批动物形银器的真伪尚有存疑。许新国在文中还指出都兰银器也具有自己的特点,但囿于材料所限,对其自身特点并未展开说明。

青海省都兰县公安局曾陆续追缴回都兰墓葬的若干被盗文物,其中部分器物藏于都兰县博物馆。霍川曾撰文介绍过一批该馆的馆藏文物,其中包括若干金银器在内,但多为小件的残件,完整器型较少。^[19]

意大利学者康马泰(Matteo Compareti)在其有关青海吐蕃金银器的论文中曾论及两件都兰墓葬出土的金银器,分别是一件有翼人身鱼尾金饰片和一件鎏金银盘,他认为第一件金饰片虽带有强烈的伊朗色彩,但很可能是吐蕃当地的产品;第二件银盘体现了希腊装饰元素,可能是来自东罗马帝国或者巴克特里亚的舶来品。^[20]另外,康马泰在文中还注意到第一件金饰与梦蝶轩藏品的相似之处。

近年来,青海吐蕃时期墓葬的科学考古发掘仍在进行中,并不时有新的材料涌现。2018年9月至2019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省海西州民族博物馆和乌兰县文体旅游广电局联合对泉沟墓地一号墓进行发掘,在后室西侧木椁外墓地坑壁上,发现一处封藏的暗格,内置一长方形木箱,箱内端放一件珍珠冕旒龙凤纹鎏金王冠和一件镶嵌绿松石四曲鍔指金杯,根据墓葬出土物特征和壁画内容风格,可以推测该墓葬为吐蕃时期墓

葬,碳14测年显示其年代为公元700年前后。^[21]这是迄今为止唯一由考古学者经过科学清理发掘出土的一批吐蕃系统金银器,出土现场保存完好,金银器的原生出土位置明确,这对于展开科学的研究工作提供了难得的条件,可望取得重大的研究突破。

与之同时,2018年9月至2019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青海都兰热水2018血渭一号墓进行发掘,墓中的填土中已经开始出土金银带具等随葬品,这次发掘的考古尚在进行中,但已见新闻报道。^[22]霍巍曾前往考古发掘现场进行实地考察,此墓紧邻此前发掘清理过的都兰一号大墓,墓葬布局宏大,地表有祭坛、立木等设施,若进入墓室(已被盗)之中可能还会有更多的考古发现。

这两次考古发掘的报告尚未出版,仅公布有若干照片,已经可预期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从发表的照片资料上观察,泉沟一号墓出土的王冠及鍔指杯显示出高超的金银制作技艺,应是当地高等级统治者的墓葬,这些带有明确出土信息的材料,将会把吐蕃金银器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此外,近年来在西藏山南地区也曾陆续发现过一些小型墓葬中出土的金银器饰片,其中尤其以马、羊等动物形象的鍔金银组合式饰片最为引人注目。这类饰片具有草原游牧文化的特征,与欧亚草原发现的“斯基泰”文化动物纹饰的风格特点十分相似,可能年代也要稍早于吐蕃时期,有可能属于西藏早期金属时代游牧民族的产物。^[23]

二、吐蕃金银器研究现状评述

现代学者中,最早关注到吐蕃金银器,并将出土器物与馆藏文物相结合进行综合研究的是前文中提及的瑞士藏学家阿米·海勒(Amy Heller)。2003年,她在《中亚吐蕃的考古文物》一文中,介绍了一批海外博物馆藏和私人手中的吐蕃金银器,她认为这批金银器一方面融合了多种外来因素,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本土文化传统和本地工匠的创新。^[24]同年,阿米·海勒在另一篇文章中对拉萨大昭寺银瓶上的人物服饰、纹样以及工艺进行探讨,

认为这件银瓶是松赞干布统治时期之后的吐蕃工匠融合西亚、中亚、中原地区的多种艺术风格而制作的艺术品,文中还对都兰吐蕃墓群出土的以及国外藏品中的相关器物进行了考察。^[25]

2013年,阿米·海勒在其《西藏古代金银器铭文》一文中,梳理了若干带有藏文铭文的传世金银器,并对这些铭文进行释读,她认为这些铭文大多表示人名,应指器物所有人。^[26]在缺乏出土材料进行比对研究时,这些带有藏文铭文的器物可以作为重要参考。阿米·海勒的研究丰富了吐蕃金银器的材料,拓宽了研究视野,其将传世文物与出土文物进行对比研究的做法也值得肯定和借鉴。

霍巍曾在《吐蕃系统金银器研究》一书和《吐蕃时代古新发现及其研究》中的第五章“近年来考古发现的吐蕃系统金银器研究”,较为系统的梳理了迄今为止考古出土的吐蕃系统金银器,在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对考古出土器物和海内外的传世品,从器型、特点风格、制作工艺和文化交流几个角度出发,对吐蕃金银器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认为吐蕃金银器当中有与唐、波斯、粟特等多种文化因素的相互影响和交融的痕迹,另外吐蕃在其扩张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带有鲜明特色的金银器系统。^[27]这些研究为目前考古出土和流传于世的吐蕃金银器的整体面貌提供了新的认识,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

在国内一些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也有涉及到吐蕃金银器研究的内容。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西藏大学的陈波先生曾发表一篇有关西藏古代金银器的文章。文中首先回顾了文献中记载的公元10世纪前西藏地区黄金的开采、冶炼和制作情况;随后梳理了汉、藏文献中记载的西藏各类黄金制品;最后,以金银制品为中心,讨论了吐蕃金银告身、文化交流等相关问题。^[28]2002年,首都师范大学的吴明娣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第一章第二节中,从文献的角度,讨论了吐蕃金银制品输入中原地区,引起了唐王朝上层阶级的兴趣,并对唐代金银器的制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9]2017年,西藏大学的王秋艳在其硕士学位论文《吐蕃政权时期西藏工艺美术研究》一文中,用一个小节的篇幅介绍了吐

蕃政权时期的金银器工艺,并回顾了以往学者的相关研究及结论,认为这些金银器既有本土文化的影响,又具异域风情。^[30]同年,湖南工业大学的孙惠茹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用简短的篇幅介绍了吐蕃金银器的类型、纹样、工艺等特征,并注意到吐蕃金银器体现的文化多样性特点。^[31]上述几篇学位论文虽不专于吐蕃金银器研究,但均注意到了金银器在吐蕃社会历史的特殊地位和价值,从不同的角度涉及到吐蕃金银器的制作、流布及其影响等问题。

在有关吐蕃金银器的个案研究方面,我国学者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开始进行尝试。如霍巍曾撰写过《考古图像中的吐蕃胡瓶》^[32]《吐蕃时代金银器上的有翼神兽》(Gold and Silver Winged Gods From the Tubo Period)^[33]等介绍性文章,对吐蕃金银器中一些特殊的器形和纹饰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和观察。2019年,霍巍与霍川又在《敦煌学辑刊》上发表《青藏高原发现的古代黄金面具及其文化意义》一文,文中注意到了梦蝶轩收藏的三组镶绿松石金覆面与都兰墓群出土的一组金覆面的相似性,认为这几组覆面均属公元8至9世纪即吐蕃兴盛时期的贵族所用,可能与苯教丧葬仪轨有关;另一方面,文章还谈到这几组覆面与西亚、中亚等地的联系,具有东西方文化交互影响的痕迹。^[34]

除传统的考古学研究之外,还有学者利用科技手段对都兰吐蕃墓群出土的金银器进行科学分析。如李秀辉、韩汝芬对都兰吐蕃墓出土的金属文物进行科学分析,其中涉及几件金银器,作者在文章中还讨论了吐蕃金银器的制作工艺。^[35]吴海涛、周双林两位通过电子扫描电镜、X-射线衍射等分析方法,对都兰吐蕃墓出土的牌饰进行科学分析,为我们提供了该样本的合金成分数据。^[36]另外,程起骏^[37]和阿顿·华多太^[38]两位非考古学界的学者也曾分别对都兰出土金银器的文化源流进行过讨论。

除直接介绍、研究吐蕃金银器之外,唐代金银器、粟特银器等相关研究也是吐蕃金银器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唐代金银器与吐蕃金银器的年代大体相当,可作为吐蕃金银器研究的重要参考对象。北京大学齐东方教授是唐代金银器研究的集大成者,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考古出土及流散海

内外的唐代金银器展开综合研究,研究主要涉及“唐代金银器的考古学期”“唐代金银器的历史渊源和兴盛原因”“唐代金银器与外来文明”等几个方面。^[39]齐东方综合运用陶瓷器、青铜器以及大量的文献材料,对唐代金银器的年代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他将唐代金银器的发展分为“飞速发展”“成熟”和“普及和多样化”三个阶段,使我们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唐代金银器的发展及演变过程。此外,齐东方教授还用较大的篇幅讨论了唐代金银器与外来文明的关系,提出了对唐代金银器产生重要影响的萨珊、粟特、罗马—拜占庭三个系统。前文已经谈及,金银器常常出现在吐蕃与唐朝政治往来活动之中,这表明吐蕃金银器与唐代金银器曾发生过广泛的交流。因此,有关唐代金银器的若干思考,对吐蕃金银器的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201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已故俄国著名中亚考古学家马尔沙克的《粟特银器》中译本。马尔沙克教授从传统上认为的波斯银器中鉴别出一些粟特银器,并将粟特银器分为三个流派:A流派带有萨珊风格,B流派为当地特征,C流派与中国唐代银器接近。文中还对各流派的演变序列及各流派间的关系进行了若干讨论。^[40]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粟特银器曾对吐蕃金银器产生过重要影响,这些器物无疑是吐蕃金银器研究的重要比对材料。

同年,葛承雍先生分析了青海省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西方神祇人物连珠饰牌银腰带,将其和阿富汗“黄金之丘”出土的金腰带进行了对比,指出两者在纹饰、工艺一脉传承,均为古希腊罗马文化系统的西方腰带。^[41]这件银腰带的时代范围已经超出了本文所论的吐蕃时代。但却引发出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作为汉唐丝绸之路要冲的青海地区,早在汉晋时代就曾出土过波斯银币等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物品,唐代吐蕃时期大量具有域外风格特点的金银器的发现,和这种文化交流的长期传统是分不开的。即便是在吐蕃占领吐谷浑、扼控青海丝绸之路之后,这种文化交流不仅没有被中断,反而更为兴盛,提示给学者们这种从长时段、宽空间研究吐蕃金银器的理论与方法。

三、结语与展望

通过上述简略回顾,我们可以发现,经国内外学者近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吐蕃金银器的考古文物资料已积累了相当数量,透过这些材料,我们可以窥探吐蕃金银器的发达程度,以及其所蕴含的大量历史信息。既有的研究成果也不同程度地涉及到吐蕃金银器研究的若干层面,反映出现阶段吐蕃金银器研究的主要特点,我们可以大致总结为“四多四少”:

一是对传世品的研究较多,而对出土品研究较少。自20世纪80年代起,经科学发掘出土的吐蕃金银器才陆续出现在研究者的视线之内。在此之前,学界主要关注的还是馆藏文物或私人藏品。目前,对于这些传世品的研究已颇为深入,但对于出土器物的研究还略显不足。

二是专题性研究较多,综合性研究较少。由于历史上一些精美的吐蕃金银器通过不同的途径已流散至海内外各地,这使得研究者在全面收集材料时面临很大的困境。因此,综合性的研究较为困难。目前仅有阿米·海勒和霍巍在这一方面进行过尝试,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显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三是共性研究较多,个性研究较少。在上述研究中,学者们较多地关注到吐蕃金银器与其他地区同类器物的共性,而较少谈及吐蕃金银器的自身特色。尤其是一些学者过分强调都兰出土金银器的域外(如粟特)属性,而忽略了吐蕃本土工匠和艺术家们对吐蕃金银器在吸收外来文化因素基础之上进行创新、创造的历史实践。

四是对于旧材料研究较多,而对新材料、尤其是出土材料的研究较少。近年来,青海吐蕃时期考古“捷报频传”,各大博物馆也相继举办了若干展览,新材料在不断增加,但相关研究却未与之同步进行。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资料发表的不足或受限而导致研究工作的滞后,另一方面,也与考古出土的金银器中完整器物较少、收藏界和艺术鉴赏界对其重视程度大打折扣有关。

总体而言,目前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展望

未来的研究前景,还有若干不可回避的问题仍亟待解决:其中首当其冲的,是非科学出土器物的年代与真伪问题。在现有的研究材料中,绝大部分都器物属于传世品或者盗掘品,缺少必要的出土信息。因此,对于这部分材料,首要工作是弄清其真伪和年代问题。首先要选定一批年代可靠的标准器物,通过细致的比对分析,明确器物之间的早晚关系,最终完善吐蕃金银器的发展演变序列。其次,是吐蕃金银器风格特征及源流问题还需要深入探讨,这既包括其个性特征的讨论,又涉及吐蕃时期金银器与外部世界的信息共享问题,这一方面的研究需要兼顾其造型、纹样、工艺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进行考察。其三,是对吐蕃金银器背后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内涵,需要结合藏文与汉文文献,将吐蕃金银器研究与吐蕃社会历史紧密联系起来,探讨这些器物产生的社会历史动因,深入思考吐蕃金银器中所隐含和象征的政治、经济以及宗教文化意义。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认为,迄今为止,考古出土的吐蕃金银器已初具规模,通过细致的对比分析,一些过去并未引起学界关注的传世而非出土材料,现已可以经过选择纳入到吐蕃金银器的考古学研究、讨论的范畴。考古学者在对这些出土器物与传世文物进行精细化观察、分析、比较、鉴定的基础上,系统地讨论吐蕃金银器的整体面貌已成为可能。这里,有三个研究重点值得重视。

第一,前人研究的侧重点是那些明显具有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比较强调吐蕃金银器与粟特、波斯、中原唐王朝类似器物的相似特征。目前,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吐蕃金银器受到唐代金银器的诸多影响,不少器物业已成为汉藏文化交流在金银工艺制作上的典范之作。我们应当继续加强对唐代金银器与吐蕃金银器之间的比较研究,从中观察唐蕃文化交流的珍贵历史印迹。

第二,在另一方面,吐蕃金银器上的确也有诸多外来文化影响的痕迹,但受限于材料,现有的研究还无法帮助我们仔细甄别出各种文化因素的具体表现细节。因此,我们还应充分关注波斯^[42]、突厥^[43]、“黄金之丘”^[44]、欧亚草原地带^[45]等周边国家和地区金银器的文化传统、风格特点、发展序列等问

题,将吐蕃金银器的研究纳入到更为广阔的时空范围内加以考察,才有可能真正做到在这个具有国际性的话题上既放眼世界,又立足本土,既从中看到吐蕃工匠对外来文化的学习借鉴,更要从中发现吐蕃金银器自身的特色和风范。

第三,虽有若干学者提出吐蕃金银器也具备自身的鲜明特色,但总体来说,学界对这一方面的研究和论述都显然不足。深入剖析各地因素对吐蕃金银器的影响、从形制、纹饰、制作工艺、金属成份分析、使用方式等不同的层面和角度入手,真正对吐蕃金银器形成较为全面、系统、科学的认识,也成为未来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综上所述,随着考古发现与相关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作为西藏考古和吐蕃时代考古的一个重要门类,吐蕃金银器的研究开始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由于金银器在吐蕃社会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和地位,以及它透过“高原丝绸之路”所折射出的中外文化交流的灿烂光芒,这一领域的研究定将为西藏古代社会历史研究拓展新的空间,为包括吐蕃先民在内的多民族共创西藏高原文明补充新的内容,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添新的篇章。

参考文献

[1][23] 霍巍.吐蕃系统金银器研究[J].考古学报,2009(1).
 [2] 唐长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隋唐五代史[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325.
 [3] 霍巍.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6-7.
 [4] 霍巍.吐蕃系统金银器研究[J].考古学报,2009(1).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297.
 [5] H. E. Richardson, Some Monuments of the Yarlung dynasty in P. Pal, ed. The Path to Void, Mumbai, 1996, pp. 24-25.
 [6][25] Amy Heller, The Silver Jug of the Lhasa Jokhang: Some Observations on silver objects and costumes from the Tibetan Empire (7th - 9th century),[J].Silk Road Art and Archeology, Vol. 9, 2003, pp.213-238.
 [7] 阿米·海勒.拉萨大昭寺藏银瓶——吐蕃帝国(7世纪至9世纪)银器及服饰考察//杨清凡,译.藏学学刊(第3辑),2007:194-238.
 [8] Philip Denwood, A Greek Bowl from Tibet[J].Iran, Vol. 11 ,

1973, pp. 121-127.

[9] Martha L. Carter, Three Silver Vessels from Tibet 's Earliest Historical Era: A Preliminary Study[J]. Cleveland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Art, Vol. 3, 1998, pp. 22-47.
 [10] 霍巍.一批流散海外的吐蕃文物的初步考察[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5).霍巍.吐蕃系统金银器研究[J].考古学报,2009(1).
 [11] Frantz Grenet, The Deydier Vase and Its Tibetan Connections: A Preliminary Note, Interaction in the Himalayas and Central Asia, 2017, pp.91-103.
 [12] 苏芳淑.金耀风华·赤豹青骢——梦蝶轩藏中国古代金饰[M].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及文物馆,2013.
 [13] 霍巍.梦蝶轩藏吐蕃金银器概述[G]//苏芳淑.金耀风华·赤豹青骢——梦蝶轩藏中国古代金饰,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及文物馆,2013:2-13.
 [14] 霍巍.金银器上的吐蕃宝马与骑士形象[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
 [15] 霍巍.一批流散海外的吐蕃文物的初步考察[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5).
 [16] 许新国.都兰吐蕃墓中镀金银器属粟特系统的推定[J].中国藏学,1994(4).
 [17]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都兰吐蕃墓[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18] 许新国.都兰吐蕃墓出土的动物形银器[J].中国西藏(中文版),2003(1).
 [19] 霍川.青海都兰吐蕃墓出土文物追记[J].藏学学刊,2017(1).
 [20] [意]康马泰.青海新见非科学出土奢华艺术品:吐蕃统治区域的伊朗图像[J].李思飞,译.敦煌研究,2020(1).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民族博物馆,乌兰县文体旅游广电局.青藏高原首次发现吐蕃时期壁画墓[N].中国文物报,2020-01-17(008).
 [22] 赵婷婷.四项考古新成果展现古丝绸之路演变[J].公关世界,2019(24).
 [24] Amy Heller, Archeological Artefacts from 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 Orientations 34/4: 55-64.
 [26] Amy Heller, Tibetan Inscriptions on Ancient silver and gold Vessels and Artifacts[J].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Bon Research, 2013, pp.259-291.
 [27] 霍巍.吐蕃系统金银器研究[J].考古学报,2009(1).霍巍.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28] 陈波.公元10世纪前西藏的黄金、黄金制品及相关问题研究[J].中国藏学,2000(2).
 [29] 吴明娣.汉藏工艺美术交流研究[D].北京:首都师范大

学,2002.

[30] 王秋艳.吐蕃政权时期西藏工艺美术研究[D].拉萨:西藏大学,2017.

[31] 孙惠茹.吐蕃时期藏族艺术研究[D].长沙:湖南工业大学,2017.

[32] 霍巍.考古图像中的吐蕃胡瓶[J].中国西藏,2016(4).

[33] Huowei. Gold and Silver Winged Gods From the Tubo Period, China's Tibet, 2018.1, Vol.29, pp54-57.

[34] 霍巍,霍川.青藏高原发现的古代黄金面具及其文化意义[J].敦煌学辑刊,2019(3).

[35] 李秀辉,韩汝芬.青海都兰吐蕃墓葬出土金属文物的研究[J].自然科学史研究,1992(3).

[36] 吴海涛,周双林.青海都兰吐蕃唐墓包金银饰的科学分析[J].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4(2).

[37] 程起骏.踏访深埋在地下的吐谷浑王国——都兰古墓群文化归属解惑[J].中国土族,2003(秋季号).古老神秘的都兰[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9.

[38] 阿顿·华多太.论都兰古墓的民族属性[J].中国藏学,2012(4).

[39] 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40] [俄]鲍里斯·艾里克·马尔沙克,著.粟特银器[M].李梅田,付承章,吴忱,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41] 葛承雍.金腰带与银腰带——从阿富汗大夏黄金之丘到青海都兰吐谷浑大墓[J].文物,2019(1).从出土汉至唐文物看欧亚文化交流遗痕[J].故宫博物院院刊,2015(3).

[42] A. U. Pope, The Survey of Persian Art, New Edition, Ashiya, Japan, 1981. 罗世平,齐东方.波斯和伊斯兰美术[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43] 林梅村.毗伽可汗宝藏与中世纪草原艺术[J].上海文博论丛,2005(1).陈凌.突厥毗伽可汗宝藏及相关问题[J].欧亚学刊(第7辑),2007.

[44] 成都市博物馆.阿富汗:古代文明的十字路口[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8.

[45] 张景明.中国北方草原古代金银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The Discovery and Research on Gold and Silver Wares from the Tubo Period since the 20th Century

HUO Wei ZHU Mi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5)

Abstract: The gold and silver wares are important research content of archeological study of the Tubo period. In recent years, some Tibetan gold and silver wares were discovered in the archaeological work on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which have become a pivotal gauge in reappraising the values of gold and silver wares handed down from generations. Generally, these archaeological finds have contributed to figure out the source, authenticity, and research values of the gold and silver wares handed down from ancient times, and are greatly significant for understanding their varieties, functions, production technology, soci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which reflects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Tibet and central plains as well as Tibet and its surrounding countries and regions. It broadens the spectrum of academic investigation in the related research field.

Key words: The gold and silver wares from the Tubo Period; The archeological study of Tubo period; The silk road on the Tibetan Plateau; Tibetan archaeology

[责任编辑:阿贵]